

2004-2006

马国川 著

中国改革纪事

大碰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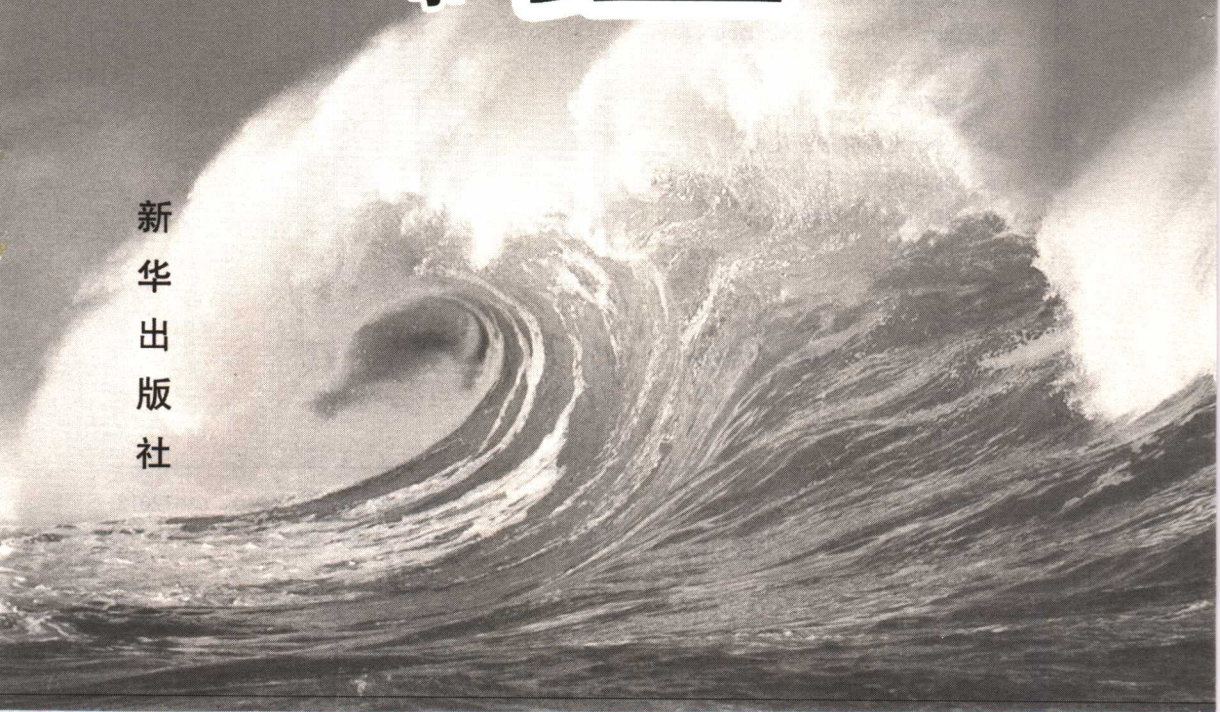
新华出版社

马国川 著

大碰撞

2004-2006 中国改革纪事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碰撞/马国川 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6.10

ISBN 7-5011-7645-0

I. 大… II. 马… III. 经济体制改革—概况—中国—2004—2006 IV. 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8456 号

大碰撞: 2004—2006 中国改革纪事

作 者: 马国川

责任编辑: 张宝瑞

装帧设计: 伍民力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 100043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河北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960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1-76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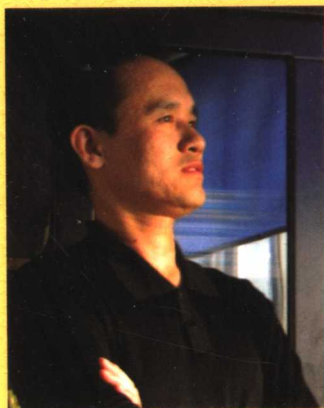
定 价: 29.8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312) 2838225

- 一篇奇文揭开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序幕
- 经济学界集体失语了吗？
- 左大培等三人致中央领导公开信
- 警惕新自由主义
- 刘国光掀起了“刘旋风”
- 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愤怒了
- 住房改革争议四起
- 香港来的“和尚”会念经？
- 刘国光：反思改革不等于反改革
- 不要动不动就“向富人开炮”
- 皇甫平再度出山掀风波
- 刘吉上书中央，不能让否定改革的观点继续泛滥
- 胡锦涛讲话，为改革争论定调



马国川 《中国改革》

杂志社资深记者、编辑。他长期关注改革大局，曾在国内多家主流媒体发表文章，被多家媒体聘为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

序

新望

吴敬琏先生把 2004 年以来的争论称为中国改革的“第三次大争论”。其实，大大小小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自邓小平南方谈话终结 1990 年前后的“第二次大争论”以来，关于“非公有制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以及“能否追问财富原罪”、“私产保护可否入宪”、“私营企业主可否入党”等争论曾一度十分激烈。牟其中、厉有为、李海仓都曾经是各个时期内备受关注的人物。马国川在这本书的开头说 2004 年 8 月的“郎顾之争”“揭开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序幕”并不十分准确，实际上大幕早已拉开，争论从未间断。只能说，“科龙事件”的极端例子把国企改革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层面，从而把改革争论推向了大众，推向了网络，使得这场爆发已久的争论最终“落地”了。

从这个意义上，把 2004 年以来的争论叫“第三次大争论”也可以成立。

第三次大争论与第二次、第一次大争论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电脑网络的参与。在网络上，任何人的发言权都是平等的，语言也更加感性。尽管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必须看到，有的网络言论（尤其 BBS）很像 30 多年前的大字报：理性让位于情绪，谩骂代替了逻辑，权威们成了造反的对象。

在争论的后期，我们隐隐约约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语言和一些似曾相识的做派，毫无疑问，有人明显想开倒车。由问题而主义，我们终究还是感觉到了这场争论关乎大是大非，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现在回过头来看，郎咸平不过是一个“中介”，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力量。

马国川是一个年轻记者，他有年轻人的大胆和敏感，有新闻视角和大众视角，我承认，他这本书写得很热闹、很好看，他也非常勤奋刻苦。我和他所供职的杂志，人手少，本职工作本来就满负荷。他担任主持人的两个时政评论栏目“观象台”和“左看右看”，难度大、要求高，但他能愉快胜任并

道来要的是理论和方法上的真功夫。我的老师施正一先生是一位老经济学家，他主张，认识和判断经济问题要学会区分假象、表象、现象、真相，能找到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而还能从现象上升到抽象。写这本书，把握好理论思维的火候就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马国川意识到了这些，并在向这个目标努力，但当我看到他几个月以来加班加点写到脸色发绿的时候，我都不忍心让他继续修改下去了。好在还有更多的专家为他指点把关。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书就是吸收了众多专家意见后的第11稿了。尽管还会有遗憾，但可以相信，全书的客观性不会有大的问题。

这场争论中，我也说过几句话，不成系统。我同意“反思改革”的说法，也认为有争论是正常的、必要的。真理越辩越明，理论就是在争论中得到发展。而且，现在的中国处在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是一个问题成堆的时期，也是一个利益博弈的时期。有问题就应该讨论，有失误就应当矫正，有正当的利益就应当让人表达，而且，即使有不同偏好也应当允许人们有不同的选择机会。

但改革的一些基本问题能不能达成共识呢？争论各方的主张能不能达成一种和谐呢？理论落后于实践，但改革开放已近30年，理论思维的猫头鹰也该起飞了。教训也罢，经验也罢，我们总该总结出一些珍贵的结论。我梳理了一下，这场争论所围绕的主要问题有六个方面：

第一，要不要改革？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当初的改革是被逼出来的，不是谁拍脑袋想出来的。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这就是改革合法性的来源。大家恐怕都承认现在的体制不完善，尤其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不改不行，改革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常态。这是可以有共识的。

第二，对以往改革的总体评价究竟怎样？这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当然这里也可能夹杂着价值判断。但如果说各人的感受和偏好有所不同的话，那么就拿数据说话，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如何？相信会有一个结论。

第三，既往改革中有哪些失误？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有或大或小的失误。这可以理解。失误的原因可能是改得太快或改得太慢，也可能是政策设计不完善，或是政策出台的时机没有把握好，还有可能是政策在执行中走形变形。对失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需要“由主义而问题”，有争论，但不该有大的争论。

第四，继续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一些人认为当前缺乏推动改革的良性动力，或者改革过程已经被“精英们”给败坏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重建规则。或者建立中立和超然的机构，或者打开公民维权的通道，开展社会参与式改革。改革的动力问题这或许是一个值得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共同探讨

的问题。

第五，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不是错了？这些年，指导中国改革的是邓小平理论，是“三个代表”重要论述，是科学发展观，一句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一直在与时俱进，怎么会错了呢？至于一些人说的经济学中“西方的东西太多”，这纯粹是一个高校内部的课程改革问题，无论如何也上升不到指导思想的高度。

第六，今后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一点，大家是不是都认可？其中，对“市场经济”大家有相对一致的认识，关键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那么能不能照本宣科呢？能不能走回头路呢？

以上问题，有的需要在争论中发展，譬如改革的动力和机制问题，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多争论是有益处的。还有些问题尽管仍然可以争论，但争下去实在没有意义了。“第三次大争论”之所以“树欲静而风不止”，大概与人们对待争论的极端态度有关。有些人对改革怀有神圣感，听见有人反思改革就难以接受；另一些人对改革的指责上纲上线，甚至动辄“清理队伍”；还有的人一会儿把社会矛盾说得很吓人，一会儿又要中央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党的领导，这纯粹就是在“捣糨糊”了。

目 录

序.....	(1)
1. 引子 中国改革：一江春水，潜流暗涌	(1)
2. 郎咸平：台湾——香港——大陆	(4)
3. 一篇奇文揭开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序幕	(10)
4. 一个有争议的制冷工程师？一个资本狂人？	(14)
5. 顾雏军向郎咸平发出了律师函	(18)
6. 经济学界集体失语了吗？	(22)
7. 杨帆的抱怨	(27)
8. 张维迎：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31)
9. 非主流集会支持郎咸平，张文魁单刀赴会	(39)
10. 左大培等三人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	(45)
11. 吴敬琏温和回应媒体 开启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	(51)
12. 社会学家眼中的郎顾之争	(56)
13. 秦晖大洋彼岸来信：要天平还是要尺蠖？	(61)
14. 杨启先：回首国企改革路，MBO 是逼出来的	(66)
15. 周其仁：我不愿意在“大政府”下讨生活	(71)
16. 法学家终于“登场”了	(76)
17. 程恩富等十位学者发表公开声明	(80)
18. 上海经济学人圆桌会议：经济争论不要泛政治化	(83)
19. 陈志武：诊断重要，开处方更重要	(87)
20. 张维迎：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应该迎合任何人	(93)
21. 旋涡里的周其仁	(98)
22. 《光明日报》八人谈：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	(101)
23. 国资委在行动	(106)
24. 2005 年是“改革年”？	(114)
25. 韩朝华：郎咸平的解决方案完全是外行的	(117)
26. 中国经济学界“诺贝尔奖”盛会上不同的声音	(121)

27. “非公经济 36 条”出台遭遇违宪质疑·····	(125)
28. 刘国光掀起“刘旋风”? ·····	(132)
29. 吴敬琏:改革的动力来自有志于振兴中华的人·····	(136)
30. 顾雏军被拘:结束还是开始? ·····	(140)
31. “中国医改不成功”? ·····	(151)
32. 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愤怒了 ·····	(159)
33. 住房改革争议四起 ·····	(164)
34. 工业化道路之争:难得的一场学术争论·····	(172)
35. 再来一次“巴山轮会议”? ·····	(176)
36. 高尚全: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	(180)
37. 十月:争论走向白热化·····	(185)
38. 丁学良: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 5 个·····	(189)
39. 香港来的“和尚”会念经? ·····	(194)
40. 新望: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何在? ·····	(198)
41. 建行香港成功上市,引爆银行改革大争论·····	(202)
42. 中国社科院学术报告厅里的掌声 ·····	(209)
43. 刘国光:反思改革不等于反改革·····	(213)
44. 《财经》杂志四人谈:不要动不动就“向富人开炮”·····	(217)
45. “皇甫平”再度出山掀风波 ·····	(221)
46. 孙立平:改革共识基本破裂? ·····	(230)
47. 站在 2006 年的门口:争论向何处去 ·····	(233)
48. 吴敬琏:这是改革开放 25 年来第三次大争论 ·····	(240)
49. 非公经济 36 条:一年盘点难称意 ·····	(244)
50. 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引起轩然大波 ·····	(248)
51. 最牛的一封信? 还是最荒谬的质问? ·····	(253)
52. 高尚全:建议中央最高领导出来讲话·····	(261)
53. 刘吉上书中央,不能让否定改革的观点继续泛滥·····	(267)
54. 胡锦涛讲话为改革争论定调 ·····	(271)
55. 尾声:树欲静而风不止,改革正未有穷期 ·····	(275)
主要参考书目·····	(281)

1. 引子

中国改革：一江春水，潜流暗涌

2003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修改宪法。在这些建议中，最受瞩目的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大多数人支持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但是也有人反对修宪。少部分人对私产入宪存有疑虑，他们觉得很多富人的财产来源有问题、有原罪，如果保护起来，恐怕会有副作用。更激烈地反对修宪者的某些极端言论已经超出了正常争论的范围。比如，他们把修宪呼吁斥之为“最反动”的主张，并声称要发动一个“护法运动”，理由是：“我们已经拥有一部世界上最先进的宪法”，“像中国仍然保有的伟大社会主义宪法的国家，已经近于绝迹。”所以要誓死捍卫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他们打出社会公正旗帜，一味高唱大众化的“经济民主”，具有强烈的煽动底层革命的民粹主义倾向。

但是，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最终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并于当日公布施行。修改后的宪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有中国首富之称的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坐在自己的车里，在手机中对记者说：我是带着笑容离开北京的，因为保护私产终于写进了宪法。

新华社主办的《瞭望东方周刊》在2005年元旦后出版的第一期刊物中，刊登了重头文章《2004是决定中国走向的关键年》。文章说，“观察2004年，可以看到中国正在试验一条新的道路，既不同于拉美，也迥异于西方；既在摆脱前苏联影响，也要在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做出超越。因此，如同1978年、1992年和1997年，2004年对于决定中国走向，是关键的一年”。

2004年1月26日，由中国改革杂志和中国体改研究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了“2004年经济社会形势座谈会”。原中顾委委员、中国体改研究会名誉会长安志文问大家：“我们的改革走到哪里去”？他的回答是：“我感觉，现在的改革不是经济改革，而是权力改革。如果只讲经济，经济学可以现学，大家可以讲很多意见。但是，我担心的是经济生活中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现在最深层次的问题是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还大。收入分配在城乡中的扩大，

在城市中的扩大，预示着不同利益阶层的出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样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就不能长治久安。

“如果我们的社会变成权贵市场经济，那我们的改革就白改了，我们的国家将前途堪忧”。安志文脱口而出的这番话，让整个会场一阵沉默，而后爆发出长久的掌声。这位中国改革的亲历者和观察者直言了自己对这场改革步履艰难的焦灼心情。

2004年7月7日，56岁的杨小凯英年早逝。这位华裔经济学家的一生坎坷而传奇：“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发表《中国向何处去？》，入狱整整10年，改革开放后投身于经济学研究，最后任教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被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赞誉为“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这位站在全世界华人经济学家金字塔顶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创立者的去世，引发了经济学界和公共知识分子的集体追思，众多经济学研究院所和独立的公共研究机构自发举办追悼活动，寄托哀思。两年前，杨小凯提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开放很成功，但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发展前景并不清晰明朗。他甚至预言，尽管俄罗斯震荡疗法后的短期社会效果相较于中国的渐进式转轨而言好像是一个失败，但由于俄罗斯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其将来发展仍可能超越中国。由此，引发了他和林毅夫2002年开始的一场激烈的论争。那场学者争论，被很多知识精英和政府高级官员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就战略级别上的中国发展所进行的最具原创性洞见、也是最有锋芒和理性精神的论辩”。通过这次论战，杨小凯有关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的深入思考，对国内精英阶层产生了强烈冲击，渐进式改革道路遭遇越来越多的思考。

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他们最新的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已经形成的十大阶层中，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农业劳动者还占44%；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如社会中间阶层只占约15%；几个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继承性明显增强，而同代内的流动明显减少，出多进少；可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社会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

这显示出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呈现出一种“哑铃”趋势，一头是财富，另一头是贫困，中间是没有长大的中间阶层。加上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接近0.5，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得中国社会积累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全球最大投资银行之一美林集团与凯捷资讯刚刚联合发布的《2004年世界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的富裕人数比2002年增长了12%，人数达

23.6 万人，总财富达到 9690 亿美元，成为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百万富翁聚集地。

对着这份报告，一位经济学家惊叹道：“中国富豪们在十几年内便能积累数亿元的财富，这在世界资本史上都不多见。”

7 月 30 日，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礪病逝。董辅礪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上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提出的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勇敢地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的论点，并发出“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历史性呼吁，当时石破天惊。后来全国人大会议修改过的“宪法”把“政社分开”的观点吸纳进去。董辅礪生前是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的资深经济学家，力主发展民营经济，最早站出来为“温州模式”辩护，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辩护人”。逝世前三个月，重病中的董辅礪写下了论述修养操行的封笔文章《守身为大》，“理论工作者是否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改革的方向，就是能否坚持学术节操的考验，让我们大家都记住‘守身为大’。”

青年经济学者赵晓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学家划分为“四代”：薛暮桥、顾准、孙冶方、于光远等属第一代；吴敬琏、董辅礪、厉以宁等属第二代；林毅夫、杨小凯、张维迎、周其仁、樊纲等为第三代；包括他本人在内的青年经济学者则是第四代。他说，第一代称得上凤毛麟角，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第二代现在寥若晨星；第三代群星灿烂，如日中天；第四代则是批量生产，正在崛起。第一代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反思，并提出商品经济；第二代建构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框架。第三代人数众多，他们参与改革发展的具体设计和运作，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国家决策，一些学者已在理论上取得突破，在国际学界也很有影响，正以研究成果不断校正着中国经济的航向；一些人走上了决策者岗位，实践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说前三代是站在市场之外或边缘在指点的话，第四代则彻底融入市场中”，赵晓说，由于市场的需求，各学府、研究机构在批量生产着第四代经济学人。他们成为金融、证券市场以及政府部门等的具体操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难以再出现吴敬琏、董辅礪这样的“大师”了。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改革先行者、当代中国重量级的经济学家，人们的评价却出现了严重分歧。多数的网民不顾董辅礪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做出的贡献，而单纯将他骂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源自此前的“股市论争”，一些网民基于社会分配不公，而对经济学家群体产生怀疑。这说明，社会公众的争议，已经在改革“现行”的要求中，将焦点集中到对一些具体的现行改革方案设计者的质疑。而这，正是随后发生的中国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社会心理背景。

2. 郎咸平：台湾——香港——大陆



郎咸平

“那时候，军官一般都带一箱子的黄金、白银，但我爸爸却仅带着一箱青岛啤酒，而且在船上就喝完了。”在许多场合，郎咸平这样回忆父亲。

郎咸平的父亲是一个山东籍的老兵，新中国解放前夕到了台湾。在波涛汹涌的海上，郎咸平的父亲花两块大洋买了一张床位，下船后又花了一块大洋买了一串香蕉，从此便身无分文。凭着勤奋、多才，他42岁就升任空军少将，但因刚直不阿、敢怒敢言得罪了不少上司，播下了日后提前退休的种子。郎咸平回忆说，小时候父亲很骄傲地对他说：“别人问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是是什么，那就是你爸爸从来没带着你妈妈到别人家去磕头、送礼……”

当时，他觉得父亲非常伟大。郎咸平的母亲是台湾化学界的名师。“妈妈很爱我，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我从来没看见我妈妈哭过。”郎咸平这样描述自己的母亲。

少年郎咸平似乎有点平庸。从小学开始，每一次考试、升学、就业都仿佛是他难以逾越的坎儿。“实在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30岁之前的郎咸平多次被逼到八面临风的绝境。在他编写的系列丛书封面“不落俗套”中，他这样自我介绍：“小学四年级即因成绩太差分到不升学班。初二又因同样原因分配到‘放牛班’学木工。”100分的初中数学考试他曾经仅得7分，初中差点没能毕业。“高一下来，数学不及格，物理也不及格。我们老师说，郎咸平呀，我看你还是念文科算了。”郎咸平善于炮轰也喜欢自嘲，那段并不如意的童年往事，常常被他各种场合信手拈来，当做花絮博听众一笑，或者成为他传奇人生的一个小小注脚。

“我当时是个混混，很自卑。”这是郎咸平当年心事的真实写照。为了对抗那些欺负他的高年级同学，甚至跑去拜了八卦螳螂拳嫡传弟子为师，混迹台北最热闹的西门町街，打遍全校无敌手，号称“西门町之虎”。他高中毕

业勉强考上东海大学经济系，又因不想考微积分，只好转到金融系。从此以后，他似乎找到了最适合他吃的一碗饭……之后就是一连串的奇迹：考上了号称“经济学家摇篮”的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

20多年后，当他在大陆最负盛名的清华大学演讲时，有学生问他的信仰是什么？郎咸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讲述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我心目中的值得我信仰的英雄就是你们以前在中学课本中念过的，叫林觉民，他写了一封信，叫做《与妻书》。他的太太叫意映，第一句话是‘意映卿卿如晤’，我用普通话讲给你们听。他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他在上战场的前一天给他太太写了一封信。他说，为了给你写这一封信，我哭了十几次下不了笔。你可能要怪我，怪我为什么能够抛妻弃子去上战场，死在战场上。各位同学要理解，一个男人要离开他最心爱的女人，而且这个最心爱的女人还怀着他的孩子，那是多么的艰难。但是林觉民说，我今天上战场去送死的目的，是希望天下有情人能像我们一样继续恩爱下去，因此必须要有人跨出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就是今天我林觉民的赴死。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当我死了之后，有一个愿望。如果你怀的孩子是女儿，我希望她像你一样温婉贤淑；如果是儿子的话，我希望他像我一样当个学者，仅此而已。林觉民第二天慷慨就义，战死沙场。69年之后，我考上了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念研究生。有一天，有一位老先生来给我们上演讲，这位老先生是文化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名字叫做林瑕藩，他的爸爸就是林觉民。上帝怜悯这位革命志士的最后一点对于国家民族的情怀，让他完成了遗愿。各位同学，我们国家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人，我期待你们和我一样，成为这样的人，好吗？”

但是，毕业后郎咸平的人生之路仍然不平坦。1983年，已为人父的郎咸平在台湾一边做记者，一边申请留学。后来，郎咸平以戏谑的口吻描述当年的心态：“在我当时并不想出国留学的，当兵退伍下来就想过小日子，就是上床老婆孩子，下床鞋子袜子的日子，准备了此残生了。当时我的教授说‘郎咸平，你这个水平不行呀。你也不要出国了，你就到银行找个事儿干算了。’所以我就找了10多家银行，但没有一家要我的。万般无奈之下，只有申请出国留学了。很不幸，GRE考了1640，TOFEL经过两次努力，考了550。我申请了7所美国大学，有6家不要我，只有1家要我，那就是沃顿商学院”。那个时候，台湾消息闭塞，很少人知道沃顿。“不是说笑，我到了沃顿后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大名鼎鼎。”

“为什么他们会收我这个笨蛋呢？因为我当时报的那个商业经济系才开办一年，那一年全世界招生10个，可就只报了7个。我一辈子不觉得我聪明，但是我很用功。”他母亲把家里的两幢房子中的一幢卖了，才为郎咸平

凑够了学费。

郎咸平横渡太平洋，从此人生开始了转机。沃顿商学院是全美最为著名的商学院之一，1986年，郎咸平只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在沃顿拿下博士学位，据说他是沃顿商学院有史以来获得博士学位最快的人之一。毕业后，他获沃顿商学院财务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讲师执教一年。此后他先后执教于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纽约大学。1989年开始对公司财务的研究比较进入状态。从1997年以后，开始将研究重心转移至亚洲公司财务金融课题。他曾于1998—2001年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股民权益的课题。

郎咸平在学术上开始崭露头角。在美国期间，他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逐步奠定了自己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他的破产论文在1990年全世界发表的金融财务学论文中排名全世界第一。在全世界论文引用率最高的28篇公司财务论文中，郎教授的论文就占了2篇。“我是研究公司治理这一问题的国际权威，也是迄今为止亚洲在这个领域取得国际层面认同的第一人。”作为学术成果得到世界一流商学院和权威财经杂志的普遍认可，郎这么形容自己。根据社会科学引用率计算，郎咸平论文的总引用率位于全世界经济学家的第122名，以著作数目平均则排名302名，以著作和年数平均，排名386名。要知道，全世界有60万职业的经济学者，而其中能够排在1000名之内的，都是被同行和业界认可的著名学术权威。

郎咸平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达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学术地位。正当他舒舒服服地当着他的教授时，朋友对他的一席话点醒他这个梦中人：“你在美国，大约有二三十位专家和你有一样的造诣，但在亚洲乃至欧洲，关于公司财务研究，你郎咸平可能是第一人。”

有时候，一句话可能改写一个人的一生。郎咸平的这位朋友可能就是这样的人。

1994年，郎咸平挥手告别了学习、生活近10年的美国。一些批评他的人说郎此后“辗转流离，去过英国、新加坡，最后由香港转道来到了信息相对闭塞的大陆”。

郎咸平将落脚点定在了香港。当时，香港有两所大学对他非常感兴趣，郎咸平最终选择了香港中文大学。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但是香港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地位，为郎咸平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地关注着内地发展变化的平台。郎咸平对政治风向的敏感度同经济风向的敏感度一样高，他清楚地嗅到内地将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地开始关注内地的经济政策。

香港中文大学于1963年10月成立，由崇基、新亚、联合和逸夫四个书院组成。香港中文大学是香港地区第一所创办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的院校，从

1966 年至今共有 3000 多名合格的工商管理硕士生毕业。高素质的生源与精心设计的课程，已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毕业生。他们遍布香港及世界各地，许多人已成为杰出的商业精英，在社会经济的不同领域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香港中文大学坐落在山上，面朝大海，烟霭微蓝透白，山色变幻无穷的八仙岭，还有那惊为蓬莱仙境的大小离岛，令人叹为观止。有人这样描绘坐在中文大学“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里看到的美景——

阳光下，那是一幅重彩油画；阴霾时，则是一幅淡墨山水。春天，清晨观楼翠谷含珠；冬季，午后远眺寒色笼仙；夏日，夕下举目飞霞长歌；秋凉，子夜抬头朗月中天。偶尔，吐露港湾晚间冷不丁泊一艘通体灯光星点的船，不禁惊异地叫一声：夜天海市蜃楼！

或许是陶醉在了中文大学的美景里？虽然是因为不安于过一种平静的学术生涯而离开许多人向往的美国，但是在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又度过了 5 年平静的学术生涯。

2000 年，他打破了这种平静。

当年，香港修订《证券及期货条例草案》，试图确立由辩方承担“提供假信息”的举证责任。草案在征询意见时，受到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等十大国际投行的强烈反对。郎咸平在立法局与十大投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主张把资本市场的操控行为变成辩方举证，“孤胆学者舌战世界十大投行”，成为香港媒体聚焦的热点。从此，在香港郎咸平总是以挑战主流和权威的形象出现。他批评香港首富李嘉诚，批评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几十年不搞学术研究”。但是香港的天地毕竟太小，所以他开始走出香港，踏上大陆。

2001 年 7 月到 2002 年 7 月左右一年的时间，郎咸平在内地做的第一件事是担任大鹏证券研究所顾问，每周去一两天。当时大鹏证券想增开营业部并进行电脑化。郎咸平的工作就是把研究所的数据和研究成果数字化，并与整个公司的电脑化结合在一起。“但一年以后失败了，”郎笑称自己被炒了鱿鱼。”正因为技术不是我的专长，所以失败了。这有一个理念的问题，大家都觉得自己挺行，但是做起来才知道很复杂，部门之间的协调也不容易。”郎咸平说，做了一年以后，发现自己有点志大才疏，做不下去了。当时大鹏证券给他的报酬是月薪 7 万元，签了一年合同。郎咸平坦陈报酬不错，在大鹏证券的一年时间过得还挺愉快。

2001 年初，深圳一本刚创刊不久的杂志《新财富》邀请郎咸平出任杂志的学术顾问。这是他在内地做的第二件事。郎咸平曾说过，他年轻时的梦想是当歌星。“空降”内地的郎咸平，当时在内地既无知名度又无地位，在圈子里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媒体正好可以放大他的声音。于是他利用这个阵地打开局面。郎咸平教授开始在国内股市极力推广“辩方举证”以及“集